

当代世界中的民主

〔俄〕维·米·波尔捷洛维奇

弗·维·波波夫*

李俊升译

关键词 | 民主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 D082

译者信息 | 男,1963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助理研究员,100732。

民主化与经济增长

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民主价值和人权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要探讨的是关于民主形成的代价这一更为普遍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早产的”民主化对经济增长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传统的智慧显然还要昭示一点,即早产的民主化并不一定就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或者甚至可以说,民主化在任何情况下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谈民主化的代价这一问题就将失去其迫切性,因为民主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目的,而且还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然而,如果民主化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有可能阻止经济增长,那么相对来说,探讨它的代价实质上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近几年,有不少研究者对那些从1974年以后迅速民主化的国家,包括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所掀起的发展“民主第三次浪潮”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果感到失望。卡罗瑟斯做过一个统计,在差不多100个试图实施民主

化的国家中,只有18个国家“真正处于走向成功的、并且是运行良好的民主的过程中,或者至少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进步,并在这一进程中保持良好态势”。^①

弗·扎卡里亚写道,在一些国家广泛出现了“非自由民主”的现象,即通过竞争来选举高层公职人员这一机制的启动比保障法律、保护人权以及诸如财产权和履行合同权的经济代理权要早。这些权利在什么制度下得到可靠保障,这些制度就被称为自由制度。显然,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秩序首先是国家秩序才能得到保障,因为“私有财产没有国家就形同名存实亡”。

欧洲就是先成为自由主义的而后来才变成民主的。在19世纪,欧洲国家的人身权和

* 波尔捷洛维奇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波波夫系经济学博士、俄罗斯联邦政府国民经济学院处长。

^① 卡罗瑟斯指出了10个已经加入和正在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以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乌拉圭、智利、韩国、中国台湾省和加纳。同时参见乔治·达依莫恩塔和此后在《民主杂志》(2002年11月13日,第3期)上的讨论文章及其随后所引发的讨论。

公民权基本上得到保护的,尽管这些国家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半以上的成年居民由于居住权、财产权和其他限制而没有投票权,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不让妇女参与投票。在过去10年经济上取得惊人成绩的国家也是沿着这么一条从自由主义通往民主的道路而前进的。

在拉美和非洲国家,民主秩序的出现比自由主义的确立要早。在20世纪90年代,可以归入非自由民主行列的是很多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果是相同的。

富足和民主水平之间的联系这一课题在一系列文章中都得到了研究。普热沃尔斯基、利蒙吉、休曼的综述文章指出,在民主的情况下,由于奉行鼓励增加消费的政策因而投资有可能减少,而宏观经济政策的质量常常因其压制院外活动集团而降低。这一系列文章的结论是,极权制有时候能更好地抵御对财产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过程中的铺张式需求,这些财产和收入是来自中低收入居民群体的,中低收入居民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大多数。

如果纵览一些关于民主和增长之间联系的研究资料,我们会看到:1987年以后所完成的研究发现,民主化程度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然而,根据更早的研究成果,即使根据同一份统计材料,在极权制国家就会呈现出更快的增长速度。为了证明民主对增长的正面影响,在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常常使用加斯蒂尔指数,这些指数不仅包括民主权利,还包括财产权、自由支配资源权等等。但是,我们要尽力揭示的是民主的单方面影响,而不是法制和民主化对经济增长所形成的合力影响。

联合国2002年度关于人权发展的报告是专门讨论民主问题的。这份报告特别指出,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依附关系,但是民主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和

均衡的作用。罗德里克在考虑了这么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诸如收入的起始水平、教育水平和国家制度的质量——之后,也没有找到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依附关系。但是他证实,民主较之于专制,拥有经济长期增长的可预测的速度,能更好地应对难以应对的休克状态,支付的工资也会更高一些(亦即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投资)。这些结论在很多方面与普热沃尔斯基、利蒙吉的文章的结论是一致的。在那篇文章中,普热沃尔斯基和利蒙吉也没有发现民主和专制之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速度方面有什么区别,但可以肯定一点,即对民主国家来说,最为典型的,就是,增长速度中的波折比较小(“经济奇迹”较少,明显的崩溃当然也较少),而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投入量就更低。^①

著名的增长理论专家巴罗总结道,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最好的就是中等水平的民主,然后——低水平,最后——高水平。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对制度软弱的国家——即民主软弱、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来说,发展民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除此之外,看来,对加强法制来说,民主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直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不能断言,民主是增长的关键条件,因为民主对法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巴罗在考虑国家发展水平的同时指出,民主与法制的发展水平没有什么联系,既谈不上积极,也说不上消极。我们看到,研究中国“经济奇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得以迅速发展,恰恰就是依赖于国家制度的有效运转。

根据P.卡普兰的观点,在收入很低、制度软弱、社会内部民族的构成又不单一的情

^① 这篇文章中最难解释的结论之一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同的情况下,较之于极权状态,在民主的情况下,出生率和死亡率较低,而人口平均寿命较高。但是,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另一个情况,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主会对人口平均寿命产生负面的影响。

况下过渡到民主社会,常常会导致强权和犯罪猖獗、官员腐败蔓延、无政府状态横行。A.赤的文章断言,西方支持资本主义与民主相结合的方式,这一方式已被西方社会所否决,并且导致财富集中在市场上占有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手中,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冲突。卡普兰、A.赤和扎卡里亚的观点在罗德里克、瓦克基亚格的文章中遭到了反驳。

需要指出,我们的研究与其他一些为数不少的研究民主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章相比有三点主要区别:第一,我们所研究的不仅仅是民主的水平,我们还研究这一水平的增长量,也就是说,按照“自由之家”所公布的政治权利指数来衡量20世纪70年代~9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第二,我们对民主和法制进行了区别,也就是说,法制是建立在权力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之上的;法制是用法制的指数、投资气候(风险指数)和腐败程度指数来衡量的。第三,我们认为,民主对增长的影响的性质要看民主化是在什么条件下来实施的。在此,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假设需要进一步检验:

(1)如果是在相当高的法制水平条件下来实施民主化,它就会刺激经济增长,否则的话,民主化的效果是消极的;

(2)在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来实施民主化,影子经济就会膨胀,国家的制度潜力遭到破坏,其结果是实施后有可能倒退到更为极权的制度。

民主化、法制、经济增长:影响的渠道

众所周知,民主社会的富裕程度、教育和发展水平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也就是说,民主可以当作“奢侈品”。人们对民主的需求,也只有在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谈得上。另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强有力的法制。速成的民主化,就像所有重大的改革一样,为滥用职权和胡乱收

税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这种再分配的势头有可能破坏制度,如果社会不能保障有力执法,就可能把社会引入混乱状态。

在速成民主化和政治文明水平低、司法体制软弱的情况下,经过民主化,公民中相当多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不懂政治纲领的人获得了投票权。这是他们完全不需要的资源,对组织良好的政治派别来说,这种资源具有很大的潜在价值。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为买卖选票、政治腐败提供了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议会所反映的也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职位和决议可以买也可以卖。腐败猖獗,制度松懈,随之抑制了经济增长。

在民主软弱(非自由民主)的情况下产生的就是软弱的政府。这些政府受到院外活动集团和推行时髦思想的集团的压制;官员和立法者出卖良知和灵魂,也变得容易被人操纵和左右。除此之外,软弱的政府不能把法律和法规付诸实施,特别是不能限制影子经济的增长,不能收集足够数额的税款用于社会福利投资。其结果就是它们不得不频繁地采用通货膨胀手段和发行国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增长速度、公民的寿命、社会公正和犯罪率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提前进行民主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是人们为在社会充分发展政治文化和确立基本的自由权利之前引入政治角逐和全民选举所付出的代价。况且,我们所描述的这些进程常常会导致广泛的不满情绪,使人们对民主的价值失望,甚至会导致独裁制度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死灰复燃,倒退到专制。

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今天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国家里,民主化进程通常是渐进的。选举权起初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诸如富裕程度、教育水平、居住

权、种族、年龄和性别,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主要是相当富裕的男子)被允许参加投票。例如,在1815~1830年期间,法国只有0.25%~0.3%的居民参加投票。对男子的全民选举权只有在1848年才启动,而对女子的选举权只有在1946年才引入。在英国,1832年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根据此法律,14%~18%的男子获得了选举权。全民选举权也只有1928年才启动。第一个让妇女参加投票选举的欧洲国家是芬兰——在20世纪初。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的妇女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了选举权。全民选举权在美国是1965年才启动的,在加拿大是1970年启动的,在瑞士是1971年启动的。

发达国家的民主化之所以缓慢,是因为统治阶层不愿与人民分享权力。选举权都是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之下伴随着社会冲突而扩大的。但是,显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速成的民主化因巨额资本或者推行时髦思想的集团巧取豪夺,国家制度也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主要的危险就是政治腐败有可能滋生。美国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在1815~1840年期间,美国由于相当快速的民主化,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党派。这些党派组建了强有力的选举机器,以便大规模收买选票,恐吓反对派。选举的结果是到处都被弄虚作假,成立了特殊的“土匪”集团,这些集团的成员多次以其他已经登记的选民的名义进行投票,并使用威胁和恫吓手段阻止其他党派的拥护者参加投票。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有这么一个事实,几乎所有成功实现追赶式发展的国家要么是在达到相当高水平的富足之前把民主化进程推后,要么是采用“一个半党的体制”(一个大的执政党和几个没有

希望执政的小反对党)。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和智利直到20世纪末,以及中国直到今天都是“推后式民主化”的例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德国、意大利都是“一个半党的体制”的例证。

也许,在我们所谈的这种事例中,香港行政区的例子是最有说服力,也最为雄辩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把土地交还给中国之前给香港行政区引人民主的胚胎,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香港在经济水平方面超越自己的宗主国——民主的故乡。无论是在英国人统治时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香港的法律和秩序都处在一个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另外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海地。海地实施的是拉丁美洲最老式的一种民主,它从19世纪初就实施全民选举。从那时起,海地就很少有法制,政府更换频繁,结果就是200年内发生了30次政变,且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3月发生的。

在表1中我们列举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在1998~2000年的政治权利平均指数的分类情况,这一分类表是由“自由之家”制作的。此表中没有列入中国、越南、蒙古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饱受战争冲突之苦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马其顿、塔吉克斯坦)。根据这一分类表,有10个国家是“自由的”(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5个国家是“部分自由的”(克罗地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4个国家是“不自由的”(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看来,“部分自由的”国家所经受的经济衰退比那些“不自由的”国家更为严重,社会不公的现象也更为严重。就这些指标来说,“不自由的”国家群接近于完全自由的国家。

表1 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制度平均指数以及经济增长和不公正

1998~2000年 的政治制度	2000年相比198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1987~1990年 的平均指数	1996~1998年 的平均指数
“自由的”	91.9%	0.21	0.32
“部分自由的”	56.8%	0.29	0.44
“不自由的”	84.2%	0.27*	0.35*

*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世界杂志》,2002年,第9页。

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经济分析

我们在上文提出了两点互相联系的假设,第一,如果是在相当高的法制水平的条件下来实施民主化,那么它就会刺激经济增长;第二,在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来实施民主化,影子经济就会膨胀,国家的制度潜力遭到破坏,其结果是实施民主化之后有可能倒退到更为极权的制度。

我们在研究民主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民主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以上这两点假设进行论证。在此,我们还要单独列举一些论据,这些论据是以25年来100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为根据的。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出处,所使用的所有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数据库珍藏着200多个国家从1975~1999年的数据。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所依据的主要变数是1975~199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这一变数用字母 y 来表示。我们要研究的是变数与民主化的依存关系。我们所选择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指数是“自由之家”所公布的政治权利指数。这一指数在1(完全民主)到7(彻底专制)的区域内变化。这一指数越低,相应的民主程度就越高。在我们所研究的25年这一阶段,开始时期的4年之内

的专制平均水准用字母 D 来表示。民主化 Δ 是用政治权利指数在1972/1975~1999/2002年的净增长来衡量,但是这一指标按大小分辨得如此严格,让人们一看就是正面的影响,显示的恰恰就是民主的增长,而不是专制的增长: $\Delta = 4 - (D_{99} - 02 - D)$,在这个公式里, $D_{99} - 02$ 是专制在1999~2002年的平均水平。

我们强调一下,所描述的指标 Δ 是一个很粗略的民主化指标。这个指标既可能符合民主权利的纯增长,也可能符合政治制度更迭的波浪式进程。实际上,民主化可能发生在我们所研究的以25年为一个时期的初始阶段,也可能发生在最后阶段。如果民主化发生在初始阶段,那么民主化的负面效果有可能由于后续的发展而得到弥补。这一指数高的数值与成功的民主化相适应,这些数值初看上去就应该与相对快的速度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指数带有净增长的性质,因此,指数“记得”政治权利水平的变化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变化也与很高的代价有关系。我们在下文列举的计算方程证实,在法制很弱的情况下,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代价按其增长的影响来说“平均”超过与民主产生的优势,因此,在相当强有力的法制下,民主化对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

我们在研究增长速度对民主化和制度质量指标的依附关系的同时,寻找制度变量的临界数值,对这些数据来说,民主化的影响会

改变标记。^①

我们先来针对 1980 ~ 1985 年间的腐败指数 CPI 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指数在 0 到 10 的局域内发生变化。这一指数越低,腐败程度越高。回溯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到,第一个方程式看上去应该是这样:

$$y = \text{CONST} + \text{CONTR. VAR} + 0.2729\Delta(\text{CPI} - 6.65) \quad (1)$$

在这个方程式中,在核算的变项的数目中加入了这一阶段居民人口数量的平均增长速度 and 1975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有的比例在一个百分点上被标记出来。

在这个方程式中,如果腐败的指数高于 6.65,民主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正面的(这是智利、马来西亚、西班牙在 80 年代初的大致水平),如果低于 6.65,影响就是负面的。

国民生产总值投资额的增加作为一个被监督的变项,不会减少民主化指标的重要性,尽管门槛的水准会发生变化,而在民主化情况下这一比例在降低,以此来显示,民主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投资额的变化而产生的。

看来,存在几个原因,使得大量研究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结论众说纷纭,甚至大相径庭。首先,在大多数文章中,所讨论的都

是民主水平高低的影响,而不是水平的净增长。第二,在很多文章中对法制(保护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公民权)和民主(保障政治权利)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并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行比较,这些国家的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是不同的,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依靠的不是专政者的意志,而是汇总法律、法规和传统。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好(腐败程度低、法制水平高、投资环境好),其民主化就会有效地影响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而那些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其民主化就会导致制度进一步削弱,并损害经济增长。

这么说来,在法制水平很低的极权制国家迅速实施民主化有可能导致很多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② 广大群众参与决策的进程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一目的很容易被败坏了声誉,如果实施民主化的企图导致制度被削弱,经济增长放缓,加剧社会不公和犯罪,最后还是巩固了极权制度。民主化只有在同时加强法制的情况下实施才能更为有效。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民主化改革速度和进程才不致于延缓经济增长,这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高 媛)

《传媒法与媒介伦理杂志》

《传媒法与媒介伦理杂志》(*Journal of Media Law & Ethics*)是同行评议期刊,其宗旨在于促进对传媒法与媒介伦理的理解,鼓励从法律、历史、心理、社会或文化角度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

刊物网址: <http://www.marquettejournals.org/medialawethics.html>

印刷版 ISSN:1940-9370

在线版 ISSN:1940-9388

(莲)

^① 临界回溯思想在波尔捷洛维奇和波波夫的文章中被广泛采用,他们的文章表明,经济政策的各种工具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国家的制度质量对增长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② 在不久前研究阿拉伯世界政治改革的文章中,布伦贝格写道,我们很不清楚,怎么改善正在自由化的专制制度。促进社会突变、完全引入竞争选举有可能导致极端主义取胜,甚至是极权主义卷土重来。